

在場的缺席者： 解讀作為一則政治寓言的小說《可愛的仇人》^{*}

翁小珉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wong23thetall@hotmail.com

摘 要

作為日本殖民時期台灣最具指標性的一部通俗小說，《可愛的仇人》這部作品對於相關研究者的價值顯然是不言可喻的；儘管如此，內蘊於《可愛的仇人》中豐富的政治意涵，經過既有研究成果的挖掘後尚有更進一步解析的餘地。藉由涉及地理政治及國族政治面向的觀察，本文試圖將《可愛的仇人》這部作品中男女主角的個人處境，解讀為一則表徵台灣／台灣人在日本殖民時期政治處境的寓言。在地理政治的面向，本文聚焦於《可愛的仇人》前半部為何將故事中的具體地名「高雄」代之以英文字母、又於後半部捨棄此種字母代號，並將這種表現手法解讀為理想中地理空間歸屬感建立過程的反映，而地理空間上的歸屬感正是在被殖民處境下個人經常會感到欠缺的；在國族政治的面向，本文則聚焦於小說中為何會有兩個名字裡帶有「華」的角色，在本身的缺席之下能分別對男女主角的行動造成關鍵性的影響力，並將這兩個缺席的人物解讀為對殖民時期的台灣而言政治上被迫缺席的中國因素。由此，本文指出《可愛的仇人》確實將台灣本島人菁英集體意識當中富有政治意涵的一個側面，經由文學加工有效地傳達了出來。

關鍵字：《可愛的仇人》、寓言、台灣、地理政治、國族政治

◎ 收稿日期：2016 年 5 月 17 日；審查通過日期：2016 年 8 月 8 日。

^{*}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不吝對拙作惠賜寶貴意見；另本文初稿係於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殖民地都市與文學」課堂上提出，承蒙授課老師柳書琴教授及修課同學多所指正，在此謹一併致謝。

一、前言

對於殖民時期文學的研究社群而言，在分析殖民地脈絡下孕育出的通俗文學產物之際，任何將相關作品視作某種政治寓言來進行解讀所開展出的詮釋可能性，大致都會是讓人喜迎樂見的；對於當代研究者而言，「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均帶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們應該把這些文本當作民族寓言來閱讀」（Jameson 著、張京媛譯，1994：92）¹並不只是一個天真的籲求，而早已構成了認識與理解居於第三世界處境的殖民地背景下任何文學作品時不容迴避的一種方法。隨著日本殖民時期台灣文學研究的開枝散葉，《可愛的仇人》這部被認為曾在戰前的台灣受到空前歡迎的通俗小說作品，²自然也不能免於歷來諸多研究者對其政治意涵的往復檢視。表面看來，這部由阿 Q 之弟（徐坤泉，1907-1954）以漢文撰寫、1936 年集結出版單行本的長篇連載作品，內容與大眾化婚戀小說的典型樣貌似乎並無顯著差異，其情節可大致簡述如下：

《可愛的仇人》描寫一對因封建婚姻無法結合的愛侶，如何不失意喪志，不被逆境擊倒，「志中」奔波四海奮鬥事業，「秋琴」含辛茹苦扶養下一代的感人故事。小說從兩人各自喪夫喪妻寫起，一直到他們衰老去世，子女各有美好歸宿為止。事業有成、情深意重的志中，閱歷廣泛，喪妻後長期暗中義助貧困守寡的秋琴一家；因緣際會下他們的子女也結成莫逆之交，進而成為人生伴侶。兩人終身不逾越道統尺度的節操，以及深藏內心遺憾終生的情緣，終於在子女一代開花結果。它不僅是日治時期最暢銷的漢文白話通俗小說，也是貫穿戰前戰後，台灣文學史上少見的一本長銷小說。（柳書琴，2011：279）³

然而，在看似軟性的表現素材之內，《可愛的仇人》那素樸的樣貌背後所挾帶的若干政治意涵，對於試圖梳理殖民時期台灣大眾文化或集體意識的研究者來說，卻委實具有不可忽視的參考價值，所涉及的面向包含但不限於本文接下來所要探討的地理政治及國族政治。本文的關注重心之所繫，即在於創造性地繼承《可愛的仇人》既有的研究成果中涉及地理政治及國族政治意涵的分析，希望能進一步自前人奠定的基礎上針對其間相對而

¹ “All third-world texts are necessarily, I want to argue, allegorical, and in a very specific way: they are to be read as what I will call *national allegories*, [...]” (Jameson, 2000: 319) 為求慎重，本文中凡有引用外文資料處，皆將原文相應內容置於註腳以便與華語譯文對照。

² 有關《可愛的仇人》在發表當時的讀者大眾接受狀況及歷來發行版本沿革等，請參照柳書琴〈事變、翻譯、殖民地暢銷小說：「可愛的仇人」日譯及其東亞話語變異〉（2011）。

³ 此處所引用的文字可視為以精簡版呈現的《可愛的仇人》全書摘要；如欲比對呈現出更多細節的摘要，尚可參考柯榮三《雅俗兼行：日治時期台灣漢文通俗小說概述》（2013：131-134）。

言容或尚未受到充分留意的一個側面，提出個人的一點觀察。

目前所知學術界針對《可愛的仇人》這部作品所累積的認識與理解，在基礎研究的部分應以柳書琴統整出來的發表成果最為完整；⁴至於相關的文化研究或文學批評，柳書琴、林芳玫、林婉吟等學者各自的分析俱有可觀之處，⁵對本文所從事的觀察具有建設性的作用，也是本文在此所要予以對話的主要目標。由於意識到上述的這些《可愛的仇人》相關研究在涉及地理政治意涵的面向似乎多著墨於該作品呈現的東亞區域跨境流動此一因素，在涉及國族政治意涵的面向則對該作品呈現的日本因素與英國因素顯得似乎比中國因素更能精準掌握，我在本文當中乃試著觀照《可愛的仇人》裡呈現的市鎮意象與華人情結，以深入前人的研究成果中在涉及地理政治意涵的面向顯得相對沒那麼清晰的台灣境內因素，還有在涉及國族政治意涵的面向那業經充分討論卻不盡然有所聚焦的中國因素，作為既有研究成果的一個小小的補充。為了使本文與既有研究成果之間的互補效用能夠最為充分地發揮，我審視《可愛的仇人》這部作品的眼光將會明顯地傾向文學批評更甚於文化研究，因此與既有研究成果在分析文本的方法上或許互有各自的側重之處；這意味著，我在本文當中進行的分析並不會深入到脈絡上的外在實證／經驗性資料，諸如《可愛的仇人》創作者的背景、⁶作品從連載到出版乃至翻譯這一連串跨媒介跨語言傳播過程，或其他社會歷史情境方面諸般細節的考察。儘管如此，我對於社會歷史脈絡的重視其實跟歷來諸多研究者並無不同，只不過我在本文當中試著採用了施淑、朱惠足等學者那種將關注外在文化脈絡的眼光內蘊於深度解讀文本的姿態；⁷這種研究上的姿態對我而言一直頗具其啟發性，爰在此乃試著將這種更常見於純文學作品批評的姿態援用來審視《可愛的仇人》這樣一部通俗小說。本文與既有研究成果之間的對話，或許透過這樣的嘗試能額外激盪出更多的幾許漣漪來，也未可知。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在本文所設定的研究範圍與研究取向之下，我所要提出並試著加以回應的主要是以下的核心問題：《可愛的仇人》此一作品在前半部將故事的發生地先以英文字母指稱，到全篇中段才寫明是高雄，表現出的可能是一種什麼樣的含義？這當中的地理政治意涵可以如何來解讀？《可愛的仇人》裡女主角秋琴的亡夫莊建華及男主

⁴ 請參照柳書琴〈事變、翻譯、殖民地暢銷小說：「可愛的仇人」日譯及其東亞話語變異〉（2011）。

⁵ 請分別參照柳書琴〈事變、翻譯、殖民地暢銷小說：「可愛的仇人」日譯及其東亞話語變異〉（2011）；林芳玫〈台灣三〇年代大眾婚戀小說的啟蒙論述與華語敘事：以徐坤泉、吳漫沙為例〉（2009）；以及林婉吟〈「文明」的磋商：1930年代台灣長篇通俗小說——以徐坤泉、林輝焜作品為例〉（2010）。

⁶ 有關徐坤泉的生平事蹟，可逕行參考高啓進〈澎湖望安小說家「阿Q之弟」：徐坤泉（1907-1954）〉（2002）；本文對這部分的資料將不再贅述。

⁷ 此處所言深度解讀文本並非西方新批評學派曾倡導的細讀文本（close reading）；蓋細讀文本時所側重的一般而言在於作品文字措辭本身的審美效果，而本文關注的則偏於深入作品敘事模式所夾帶的文化、政治上意涵。

角王志中的亡妻淑華這兩個自始即缺席的人物，在作者筆下被賦予的特定共通點，是否透露出了某種值得玩味的訊息或暗示？這當中的國族政治意涵可以如何來解讀？經由深度解讀文本的過程，我將試著指出，一方面，《可愛的仇人》裡故事上演的舞台從原本一個冰冷的字母代號轉變為讀者較能感受到人情溫度的稱呼「高雄」，其實可以被解讀為空間歸屬感的從無到有，亦即人與土地或人與環境真正的連結在各種波折之後的確立，在此市鎮的意象成了所謂應許之地一般的表徵；另一方面，《可愛的仇人》當中莊建華及淑華這兩個名字裡都帶有「華」這個字的角色，則可以被解讀為隱晦表現於作品內的「中國」因素，而這兩個人的早逝以及兩者各自的婚配對象在喪偶後的守貞，表徵了與中國中央政權已然喪失實質連帶的被遺棄社群對舊有國族身分認同的執著，相當於一種天朝遺民對已然故去的宗主關係仍執拗地保持忠誠的華人情結。透過以上分別由涉及地理政治及國族政治這兩個面向觀察到的解讀線索，詮釋者因而可以更為充分地將《可愛的仇人》視作一則政治寓言來掌握；這部作品當中呈現的那深具政治意涵的市鎮意象與華人情結，或可藉之為吾人折射出被殖民時期台灣都會漢人社群集體意識的一個側面，值得細加咀嚼。

二、應許之地的懸置與獲致：《可愛的仇人》中的市鎮意象

相較於市鎮意象的渲染，事實上，東亞區域架構下各地的交流互動狀況在《可愛的仇人》這部作品中呈現出的樣貌，才是既有的研究成果在探討其地理政治意涵時更為關注的；在此，本小節的討論即起步於扼要地回顧前人的相關分析，然後再進一步地介紹學者施淑有關日本殖民時期純文學作品中市鎮意象的論述，最後再引入這種論述觀點來藉以重新審視《可愛的仇人》這部作品，以挖掘出前人相對沒有特別留意到的地理政治意涵。

在《可愛的仇人》裡陸續粉墨登場的諸多人物，雖然活動範圍皆以台灣本地為主，當中卻不乏曾為各種考量而或長久或短暫地遠赴日本東京、中國福建等海外異域發展者，包括王志中與王萍兒父子、秋琴的弟弟天春、秋琴的女兒莊麗茹及么子莊阿生等；對於歷來《可愛的仇人》這部作品的研究者而言，此種安排反映出的，即相當於在日本殖民帝國影響力籠罩下的東亞各地交流互動狀況趨於頻繁密切的跡證，而台灣／台灣人作為這區域架構下的一個環節所展現在這個互動交流網絡中的能動性、積極面，亦成了掌握《可愛的仇人》這部作品夾帶的地理政治意涵時不容輕忽的重中之重。如將徐坤泉筆下的作品與稍晚於徐氏的另一位通俗小說名手吳漫沙之作並觀，或可察覺到「隨著台灣青年到日本或中國求學或生活，這些小說〔……〕隱約透露出作者對於台灣在時局與世界體系下所處位置的思考」（林佩吟，2010：21）；集中考察《可愛的仇人》這部作品，

亦可明顯感受到其間深具地理政治意涵的所謂「台灣本位性」，亦即「依著台灣人〔……〕在東亞世局變化和島內生存瓶頸交逼的現實中，如何在日本、中國、東南亞、南洋尋覓他們各自的新人生。」（柳書琴，2011：312）上述這些見解，不可否認地在探討《可愛的仇人》中涉及地理政治意涵的面向之際均能深中肯綮，然而除了這些偏向境外因素的考察，《可愛的仇人》這部作品夾帶的地理政治意涵是否還蘊含了值得留意的台灣境內因素這個側面尚待充分揭示，容或有更進一步審視的餘地；在此，施淑對於日本殖民時期台灣純文學作品中市鎮意象的論述，當有助於激發吾人審視相關地理政治意涵時所需的洞見。

施淑在針對台灣的新文學發展初期嶄露頭角的作家作品當中蘊含的頹廢意識加以分析時，頗為敏銳地將其觀察重點置於這些純文學作品所呈現出的殖民地時間與空間形態上，而其中有關空間的部分顯然牽涉到的正是地理政治的面向；在她那篇試圖將自身人文關懷深入殖民時期台灣知識分子集體意識幽微處的論文⁸中，施淑具體地指出，此時期的台灣文學作品裡所以會不時地出現以英文字母指稱的地點，而不去明確地實指任何一個特定的台灣城市村鎮，根本的原因可以理解為在被殖民狀態下對於偏向負面的地理空間經驗或感受的某種銘刻：

市鎮，一如它那失去了歷史地理歸屬感的英文大寫字母的名字，對於生息其間的人來說，展現的是一個未知的空間，操作其中的是同樣陌生而複雜的機制：通行取締、道路規則、飲食物規則、行旅法規、度量衡規紀，等等。這些以法律形式出現，貫徹著帝國的鐵血意志的規紀，自有其現代性的內涵，但對於占有台灣人口數愈來愈多的新興市鎮居民，它們的意義，就像賴和的〈一桿秤子〉裡說的：「舉凡日常生活中的一舉一動，通在法的干涉、取締範圍中。」（施淑，1997：108）

就此觀之，殖民時期台灣小說當中這種將故事發生地以英文字母來指稱的手法，實際上具有相當強烈的政治意涵；創作者藉由這種手法，將空間政治化，以表達其特定意圖或訴求，使讀者從地理符號的去脈絡化來體會到文化歸屬感的飄忽無根這麼一層寓意。當然了，以這樣的論述來認識與理解在創作上越有特定自我意識的作家作品，應該會越有說服力，而施淑的一系列分析也是針對這一類作品所發，其論述基本上係屬純文學的批評；從她選擇舉出賴和作品為主要說明案例，再加上該論文後續提出的其他作家作品，可以看出施淑的探討範圍似不及於通俗文學產物才是。

⁸ 請參照施淑〈日據時代台灣小說中頹廢意識的起源〉（1997）。

儘管如此，如果通俗文學的研究能對於純文學批評論述觀點採取具創造性的繼承而非簡單的嫁接，那麼，在純文學作品與通俗類的文學作品之間並沒有一個楚河漢界來截然劃分的情況下，挪用相關批評論述的內容來分析一部通俗小說的表現手法或許也未嘗不可；就《可愛的仇人》而言，由於作者將故事發生地以英文字母來指稱所造成的效果與純文學作家的手法間看不出有明顯差異，施淑對於市鎮意象的論述若要適用於這部作品應當是有其根據的，但是考慮到這種手法在《可愛的仇人》中的操作情形前後有別，市鎮意象在此所承載的含義因而便顯得更形複雜卻也更加意味深長。在《可愛的仇人》前半部，作者並未透露故事的具體背景是台灣的哪個市鎮，只以「K 地」(78、140、180、200、202、206、321) 及「Y 地」(112、114-115、119、125、140)⁹來指稱主角一千人等居住的那一帶，其中 K 地為秋琴一家落魄時的原居處，可能相當於舊市區，至於秋琴一家接受王志中以「夜行人」名義暗地資助後搬往的 Y 地則是「新興的地頭」、「生活程度比較的高些」(115)，可能相當於都市計畫實施後新建的高級地段；讀者雖然可以從作品中諸如「壽山上的碧綠森林和黑色的西子灣海砂」(128) 這樣的線索推想 K 地、Y 地指涉的就是高雄，卻無法從作者筆下得到一槌定音的證據。到了整部作品的中段，「高雄」的地名開始間雜於原本的英文字母代號中出現了(206)；隨著秋琴一家的新生活往往後的歲月越來越上軌道，「高雄」也完全取代了英文字母代號原先的強勢地位而頻頻出現(279、292、312、346、353、402、407、412、424、517、522-523、529)。對於這當中可能的地理政治意涵，究竟如何解讀為佳呢？

《可愛的仇人》裡故事上演的舞台從原本冰冷的字母代號過渡到感受起來更有人情溫度的高雄，這樣的轉變如果看作一種創作上的表現手法，那麼，這種操作或許意在刻劃空間歸屬感從無到有或者從匱乏到豐盈的過程，亦即人與土地或人與環境真正的連結在各種波折之後的積累、鑄就。市鎮意象的遞移，在此成了猶如一方應許之地從懸置到獲致這個過程的表徵；當「高雄」完全取代了英文字母代號原先的強勢地位，即意味著一個新天新地終於在滄海桑田之後為歷盡了艱苦的奮鬥者開啓，精神上無根的漂泊乃告了一個段落。觀察秋琴對自幼所居的 K 地畫龍點睛的一番回顧，諸如「K 地的資本家、大都是土豪劣紳、土頭土腦之輩、〔……〕萬事萬物以金錢為中心、完全絲毫不致意到兒女的教育、貧則脅肩諂笑、富則驕奢淫逸」(180) 等，可以看出此地的人文環境不堪的一面；以金錢為尚的風氣與資本家的墮落，即相當於前引施淑的論述中提及的現代性內涵的一大特徵，雖然其壓迫原理與施淑著墨較多的法律規紀作用看似不盡然相符，但若

⁹ 本文所參考的《可愛的仇人》為前衛出版社 1998 年版，此處及下文所標記出的均為前衛版的頁數，爾後將不另加註說明。據柳書琴考證，前衛版與原版內容幾無差異，故本文比照其餘研究者採用前衛版《可愛的仇人》為查考依據；有關各版本《可愛的仇人》比較，具體細節可參考柳書琴〈事變、翻譯、殖民地暢銷小說：「可愛的仇人」日譯及其東亞話語變異〉(2011：280-282、295)；另亦可參考高啓進〈澎湖望安小說家「阿 Q 之弟」：徐坤泉(1907-1954)〉(2002：190)。

把資本家對金錢的追逐視為在資本流動的現代金融法制規則下從事的賽局，那麼在兩者其實殊途同歸的情況下施淑的批評觀點或許仍然是適用的，亦即《可愛的仇人》確實以作品裡的英文字母代號經營出了偏向負面的、頹廢的一種市鎮意象。隨著小說人物的際遇轉折，原有的這種地理空間經驗或感受自然要發生相應的變化，於是字母代號乃被明確的「高雄」給取代，意味著這同一個地點在往昔與當今已經具有了不同的價值。不管是不是真的來自上帝，所謂「上帝的錢」對小說人物原有生活的介入，確實使得金錢的意義對於接受資助的秋琴一家——其實對於暗地提供資助的王志中又何嘗不是——展現出與過去完全不同的一面，從而讓秋琴一家與王志中猶如在精神上自 K 地這個拜金的沉淪之城抽離出來，掙脫了原先那汗濁的人文環境對雙方的桎梏；他們當然還是居住在同一個市鎮上，只不過這裡已經不再是 K 地，也不會僅僅是 Y 地，而是高雄——一個不再顯得只有物欲橫流，而是彷彿也間或流著奶與蜜的地理空間意象；不再猶如一個被剝離了有機脈絡的空洞符號而存在，而是一個足以使居留者滋生並維繫充分歸屬感從而扎根於斯的堡壘。

從這個觀點來看《可愛的仇人》裡的市鎮意象，我們可以發現，這樣的一個側面使得《可愛的仇人》夾帶的地理政治意涵在既有研究成果多所矚目的東亞區域跨境流動因素外，又添上了一筆可以相輔相成的台灣境內因素；它與歷史經驗上的現實高雄或許直接關聯並不特別大，其所以能發揮在此被形容為相輔相成的效果，在於意象的層次上與跨境流動因素間的內外互補。《可愛的仇人》不吝於凸顯的台灣／台灣人積極進取並在東亞區域架構下追求自主性的理想形象，一方面有賴於外在的、檯面上的各地交流互動網絡提供現實條件，另一方面也有賴於自身內部抽象的社會氛圍；如果自己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都無法具有歸屬感，無法與自己的周遭環境確立起熱烈的堅定連結，即使在異域闖蕩終而找到一條出路，這樣的成功難免是有缺憾的，而大眾的集體意識不免總是會偏愛圓滿的成功更甚於有缺憾的成功。《可愛的仇人》作為一部受到空前歡迎的通俗小說，理當不會僅止於提供有缺憾的成功來慰藉廣大讀者，因此，在較容易觀察到的東亞區域跨境流動因素外，市鎮意象的經營或許可以被視為該作品用來補上這個缺憾的境內因素；在探討《可愛的仇人》中涉及地理政治意涵的面向時，對市鎮意象的分析足以使我們既有的認識與理解增加一個延伸的維度，藉以得悉這部作品所追求的所謂「台灣本位性」那內外兼修的理想樣貌：隨著內在的地理空間經驗或感受得到平撫乃至安頓，台灣／台灣人在外部地理空間網絡縱橫馳騁的矯健步履也相應激盪出更為有力的迴響。

敏感的讀者對於本文提供的以上這一番分析，或許會察覺到其用意似乎在引導吾人進一步將《可愛的仇人》解讀為一則政治寓言，由秋琴及王志中共同來表徵台灣／台灣人的政治處境；事實上，正如我在本文開頭所述，這樣的一種解讀方向，原本就應該是當前的詮釋者喜聞樂見的，故本文自然沒有不去往這個方向嘗試的道理。只不過，除了

本小節至此所討論的地理政治意涵，是否還有其他面向足以提供吾人更多觀察線索，來增益此種政治寓言式解讀的具體內涵呢？以下，我將把焦點從地理政治轉移到涉及國族政治的面向。

三、 亡靈暗影的負載與不在：《可愛的仇人》中的華人情結及其他

從《可愛的仇人》這部作品呈現的若干台灣本島人物居旅婚嫁等生命經驗的過程，讀者們可以看出，或許由於作品裡外國／異族人士即便戲份不多卻足以在本島人生活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使得國族政治的面向對《可愛的仇人》歷來的研究者而言總顯得不無細加打量的價值。本小節的討論，涉及了既有研究成果中對於《可愛的仇人》呈現的英國因素與日本因素的觀察，不過這些內容在此並不會占據過多的篇幅；在介紹了學者朱惠足有關日本殖民時期特定純文學作品內國族政治意涵的論述後，我將順著該等論述觀點所提示的思路來深入《可愛的仇人》呈現的華人情結那糾葛的一面，著力於在這個小節盡可能充分探討個人從這部作品觀察到的中國因素。

在《可愛的仇人》當中登場的英國人角色計有兩位，包含常駐於市鎮裡的教會專事服務的一位被稱為「姑娘」的女性神職人員，還有到日本短期停留的一位牧師；這兩個角色戲份雖少，卻在作品中對整個故事的走向具有極其重大的影響力，前者在王志中暗中資助秋琴一家的過程裡居間中介、出面勸說秋琴接受「上帝的錢」進而扭轉了一家人的命運，後者則挽回了與王萍兒感情生變後在日本野外的雪地尋死的莊麗茹、避免了一樁大不幸。從上述情節的安排來檢視存在於《可愛的仇人》當中的英國因素，我們可發現這些英國人角色所發揮的功能不僅與其國族身分有關，似乎在更大的程度上還涉及他們從事神職工作的身分背景，只不過這裡的神或許與基督教本身沒有太大關聯，而是讓人想起傳統上在檢視通俗劇裡善惡有報神蹟靈驗一類情節時評論者會使用的術語「機械降神」(*deus ex machina*)，就如林姍吟所形容的，《可愛的仇人》這部作品「呈現了既中且西的宗教視界。[……]當秋琴走投無路之際，基督教的力量卻如 *Deus ex machina* 出現。」(林姍吟，2010：16)當然了，這樣的見解不免是在將作品裡英國人角色的國族身分重要性相對淡化後所得來的；如果《可愛的仇人》改讓義大利人、葡萄牙人甚至日本人扮演提供關鍵援救的「機械降神」角色，而不是由英國人擔綱，其效果是否會有所不同？柳書琴認為《可愛的仇人》「自覺或不自覺地表達出英美國家在世界體系的地位經營比日本更優越、強盛」(柳書琴，2011：315)的這樣一種看法，或許適足以提醒讀者，這部作品所呈現的英國因素最根本的政治意涵仍當置於國族政治而非宗教或其他面向來

探討，並且對於各國族勢力消長的動態全局應予一併留意。相較於作品裡的英國因素，日本因素在《可愛的仇人》當中呈現的樣貌，或許更足以反映出國族生態上各方彼此傾軋的動態面。

在《可愛的仇人》當中頗為搶眼的兩個日本人角色，嚴格來說其實只有一個半，亦即在王萍兒留學東京後期與之譜出戀情但最後被拋棄的年輕寡婦「君子」，以及成年後嫁給秋琴長子莊阿國的日本內地與台灣本島混血少女慧英；從這部作品如何去呈現日本女性角色與台灣人男伴間的互動過程，以及最後安排的結局，讀者們或許可以看出國族政治意涵被寄寓在性別關係來加以操作的痕跡，亦即「小說中，慧英父親遺棄其母、萍兒在三角戀愛中捨下君子，兩代殖民地男性不約而同拋棄了他們的日本女人，〔……〕並沒有特別顧慮日／台民族權力位階的敏感性。」（柳書琴，2011：312）只是，這部作品所以顯得並未就此特別顧慮，究竟是出於天真、出於不忍，或是存心逆向操作，這當中夾帶的國族政治意涵總是不免讓人玩味。如依據帶有反殖民色彩的一種解讀，《可愛的仇人》實際上「將陽剛強勢的殖民者逆轉為柔弱可憐的女性，一方面滿足了被殖民男性對殖民國家女性的情慾想像，另一方面也很弔詭的呈現出集體潛意識層次台灣認同的焦慮：日本一半的是根源，卻又注定是被拋棄與失落的根源，台灣父親則是既定的現實。」（林芳玫，2009：47）就此觀之，小說裡向某一極傾斜的二元性別關係所要補償的，即相當於現實中向另一極徹底傾斜的國族權力關係；現實中在被殖民處境下匱乏的欲求，藉由小說裡虛擬層面的逆向操作得到了替代性的滿足。

以上所探討的，算是《可愛的仇人》在國族身分這方面以逆向操作手法來呈現日本因素時主要的樣態，只是其全貌自然不僅止於此；除了以作品裡虛構出的性別關係來翻轉現實中的國族權力關係之強弱尊卑，另一種《可愛的仇人》所採用的逆向操作手法或許可以由作品裡日本人角色在台灣社會稀薄到異乎尋常的身影得見，其效果相當於翻轉了現實中日本殖民者對台灣本島人生活世界的高姿態介入、干預，而這種操作手法正是朱惠足在分析特定日本殖民時期台灣純文學作品的反殖民色彩時提醒讀者留意的。從《可愛的仇人》安排給主角們活動的故事舞台背景裡，我們不僅完全在這個再現後的殖民地社會辨識不出任何殖民者清晰的個別身影，甚至從王萍兒、莊麗茹與莊阿生負笈東京期間的那幾個章節也看不到對任何一個日本老師或同學稍費筆墨的具體描寫；唯一的一個叫得出名字且戲份不可謂少的日本人角色「君子」，乍看之下似乎也無法讓讀者感受到其日本人身分在作品中的必要性，以致於張文環在將《可愛的仇人》譯為日文版時還直接把這個角色改為在日本發展的朝鮮人，¹⁰而這種將被殖民者生活世界中殖民者的在

¹⁰ 有關作品中的君子這個角色在原版與日文版的身分背景經譯者張文環改動前後的對比，可參考柳書琴〈事變、翻譯、殖民地暢銷小說：「可愛的仇人」日譯及其東亞話語變異〉（2011：286-287）。

場狀態給極度淡化乃至抹煞的做法，正相當於朱惠足在探討殖民時期台灣純文學名家呂赫若的若干作品如何表現反殖民色彩時不吝強調的：

在〈財子壽〉等呂赫若一系列的台灣風俗小說中，戰時下對在地家父長秩序造成強大威脅的帝國系譜完全被抹除，彷彿日本人殖民者根本不存在一樣，〔……〕我們可以說，〈財子壽〉對抗式地提出一個閉鎖的台灣人家庭生活世界，一個完全不受皇民化及人為的、外來的帝國系譜影響的世界。因此，小說中對於歷史與社會背景之刻意消弭，與其說是逃避政治壓迫，不如說是一種激進主義，抵抗皇民化的暴走，提出異議的在地認同與主張。（朱惠足，2009：257-258）

當然了，一般在觀察《可愛的仇人》這部作品中呈現的日本因素時，或許不會想到其表現手法有足以被稱為激進主義之處，畢竟《可愛的仇人》與這些被認為「激進」的呂赫若作品從語言、發表之際的時局、訴求的讀者品味等各方面都有顯而易見的差異，然而，當吾人聚焦於涉及國族政治意涵這個面向的核心處，那麼我們恐怕就必須進一步去琢磨這些差異究竟是根本上的分歧、抑或只是表面上的出入呢？讀者倘若不假思索地傾向於前者而忽略後者的可能性——亦即忽略《可愛的仇人》其實在國族政治面向有可能正如同呂赫若那些作品一樣激進——的話，即使不是過於天真，也顯得對殖民地脈絡下孕育出的文學作品可能夾帶的反殖民意涵過於缺乏應有的敏感度。

朱惠足的觀點對本小節所進行的討論最具啟發性的一環，除了其見解本身的開創性，或許還在於其適足以再一次提醒吾人一個文學批評工作者傳統上應有的自我期許，亦即，在解讀一部作品時，除了要留意作品裡呈現出的事物，還必須留意這作品裡本來應該要出現卻沒出現的事物；這種不尋常的缺席或不在場，常常會是夾帶關鍵政治意涵的要點所在，因而具有特別重要的分析價值。例如，在地理政治的面向，本來應該要在作品中簡單寫出來即可的具體地點，卻在殖民時期台灣若干文學作品裡被突兀的英文字母給取代，構成了原有地理名稱一種不尋常的缺席，於是有了施淑的一番關於市鎮意象的論述來闡發這當中可能夾帶的政治意涵；同樣地，在國族政治的面向，當我們發現某些殖民時期文學作品明明走寫實路線，卻明顯地避開足以在殖民地社會投影出巨大身形的那一群殖民者而不予勾勒，應當也可以合理地懷疑這構成了特定國族身分的不尋常缺席，而朱惠足對呂赫若作品的激進式解讀成果正是著眼於此處可能夾帶的政治意涵所獲致。就此觀之，當我們察覺到《可愛的仇人》全篇出現的日本人角色居然不多於英國人時，這其間的政治意涵當然有足夠的玩味餘地值得去細細咀嚼；只是，總觀《可愛的仇人》全書，我們不可忽略的是，比起日本人，其實還有另一種國族身分更加不尋常地在作品中徹底缺席了，那就是中國人。在此，我們必須警覺的是，中國人與台灣本島的漢人究竟曾經將彼此視作同胞的成分或異族的成分多些，始終是一個無法三言兩語理清頭

緒的複雜問題，因此，在檢視《可愛的仇人》裡呈現的中國因素之際，如果遵行如上述探討英國因素及日本因素時採用的同樣步驟難保不會失之輕率。話雖如此，無巧不巧的是，《可愛的仇人》當中似乎恰恰有個再適合不過的切入點，足以讓我們從中觀照這其間的千頭萬緒、爬梳那無比糾葛的一面，此即莊建華與淑華這兩尊亡靈，秋琴與王志中那分別早早謝世的配偶；接下來本文針對《可愛的仇人》裡呈現的中國因素所進行的分析，將著落在這兩位逝者以及他們對各自的未亡人所具有的意涵上頭。

有關莊建華及淑華這兩個角色在《可愛的仇人》作者筆下被賦予的共同點，除了兩者都被安排早早過世於全篇敘事時間開始前以致無法在作品裡活生生地粉墨登場，另一個共同點似乎就只剩兩人的名諱裡都有「華」這個字了；然而，這個並不罕見的字一旦經由讀者細細琢磨，卻足以透漏些許玄機，隱隱暗示了有意深究作品國族政治意涵者不妨將其解讀為隱晦表現於作品內的「中國」因素，而讀者一旦採取這種視角來解讀，那麼這兩個角色的早逝以及兩者各自的婚配對象在喪偶後的守貞等一連串安排，也都將隨之而問題化——在這被問題化了之後的視野中，亡靈所表徵的依稀不再只有個別的逝者；經由「華」這個字與「中國」的聯繫，故人的暗影所負載的彷彿是整個故國的重量，於是未亡人對亡者單方的守貞承諾及隨之而來的無論如何就是不再嫁再娶的舉措，便影射了被母國遺棄的政治社群對舊有國族身分認同的執著，相當於一種天朝遺民對已然故去的宗主關係仍執拗地保持忠誠的情結，一種華人情結。如以秋琴這個角色為中心來政治化地看待她與兩位重要男角的關係，那麼王志中相當於她的身分認同選項裡的台灣因素、莊建華這個以「華」字為名者對她則相當於中國因素這另一個選項；前者是她的欲望，卻也是她受制於主客觀限制而永遠無法坦率面對的終極渴求，後者則是她在尚無法決定自己命運的情況下就被設下的羈絆，卻也從此深深烙入其內在深處而形成無法剷除的心理情結，即使本身亡故了仍足以糾纏她的意識而左右她的關鍵行動。同樣地，如以王志中這個角色為中心來政治化地看待他與兩位重要女角的關係，那麼秋琴相當於他的身分認同選項裡的台灣因素、淑華這個以「華」字為名者對他則相當於中國因素這另一個選項；前者既是他的真切欲望卻又是他不願面對的終極渴求，後者則意味著他出於內疚感而始終無法擺脫的一道枷鎖、一種心理情結，其入人之深，同樣到了即使人都已經香消玉殞仍足以糾纏他的意識而阻礙他去發展第二春——或者重吃回頭草——的地步。在這裡，本文對《可愛的仇人》所進行的解讀既以秋琴為中心、又以王志中為中心來出發；此種交錯而非單一的立基點，是否在觀察上不無造成混淆之虞呢？同樣地，當本文將莊建華及淑華分別解讀為在《可愛的仇人》裡彰顯中國因素的功能性載體時，要如何才能不至於因為這兩個角色本身恰恰相對立的性別身分位置而造成混淆呢？回顧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曾基於第三世界小說作品特殊的寓言性而籲請研究社群多予留意的文本解讀要領，我們可以發現，這種交錯對位的參差並置其實很可能正是政治寓言的幽微本色之所在，就如同林芳玫在援用詹明信見解來分析日本殖民時期另一台灣通俗小說

《日華英雌傳》時發現到的：作品中特定女性角色的性別身分位置完全可以既用來表徵「日本」、又隱約意味著「中國」，而若干男性角色的性別身分位置亦是如此，看似可以簡單對應到日華關係中強勢一方的國族身分位置、卻又未嘗不能對應消極被動的弱勢一方；¹¹以下，本文乃比照此種操作取徑，惟將著眼點從日華關係挪移到了「中國－台灣」的關係之上，試著探討《可愛的仇人》裡與性別並置的國族身分所可能夾帶的幽微政治意涵。

傳統上，在面對帶有寓言色彩的作品時，一般而言「我們對寓言的傳統概念認為寓言鋪張渲染人物和人格化，拿一對一的相應物作比較」（Jameson 著、張京媛譯，1994：97）¹²而去形塑我們初步的認識與理解，這或許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傾向，因此，當我們抱持著這種初步的態度去解讀《可愛的仇人》此一政治寓言時，我們同樣會很自然地希望在作品裡找到的是「一對一的相應」，而這促使我們或許不自覺地期待同一種國族身分位置可以被單純地對應到同一種性別身分位置——比如「日本」在這部作品中就完全由「女性」角色慧英及君子來代言；只不過，這種初步的態度往往傾向於忽略了「寓言精神具有極度的斷續性，充滿了分裂和異質，帶有與夢幻一樣的多種解釋，而不是對符號的單一的表述」（Jameson 著、張京媛譯，1994：97），¹³就如同魯迅的《阿 Q 正傳》這部經典寓言當中，一方面「阿 Q 是寓言式的中國本身」，但另一方面「那些喜歡戲弄像阿 Q 一樣的可憐犧牲品，從中取樂的懶漢和惡霸——也在寓言的意義上是中國」（Jameson 著、張京媛譯，1994：98），¹⁴而這種斷裂的、歧異的對應關係恰恰也彰顯於《可愛的仇人》裡「中國」與「台灣」這兩者各自對應到的特定角色看似混淆的性別身分位置之上。從《可愛的仇人》當中諸多生者追憶故人的段落裡我們可以看出，王志中在與淑華的婚姻生活中其實是以自我為尊以致虧欠對方甚多的，他往後的內疚也是因此而來，至於秋琴在與莊建華的婚姻期間則顯然犧牲極大、為了對方吃盡苦頭；正因為如此，一旦意圖要指認出《可愛的仇人》裡特定國族與特定性別身分位置之間如何對應時，讀者將會發現，男女婚配關係中強勢的男性位置既是台灣又是中國，而弱勢一方的女性位置同樣也既是中國又是台灣，相當於意味著「中國」與「台灣」沒有哪一方在兩者的互動進程中能稱得上完全對另一方所經受的壓抑與傷害是清白無辜、毫無責任的。作為一部政治寓言，《可愛的仇人》藉其與性別並置的國族身分指涉效果所夾帶的此等歧異與

¹¹ 完整的論述內容請參考林芳玫〈謝雪漁通俗書寫的跨文化身分編輯：探討〈日華英雌傳〉的性別與國族寓言〉（2013）。

¹² “Our traditional conception of allegory - based, for instance, on stereotypes of Bunyan - is that of an elaborate set of figures and personifications to be read against some one-to-one table of equivalences [...]” (Jameson, 2000: 324)

¹³ “[...] allegorical spirit is profoundly discontinuous, a matter of breaks and heterogeneities, of the multiple polysemia of the dream rather than the homogeneous representation of the symbol.” (Jameson, 2000: 324)

¹⁴ “Ah Q is thus, allegorically, China itself. [...] his persecutors - the idlers and bullies who find their daily pleasures in getting a rise out of just such miserable victims as Ah Q - they too are China, in the allegorical sense.” (Jameson, 2000: 325)

斷裂，堪稱充分展示出了詹明信所強調的那必然頭緒繁多的寓言本色；而當詹明信將這種特性形容為與夢幻一樣之時，其實不無進一步指向特定心理情結在集體意識中盤根錯節的運作樣態之意。對於被殖民時期的本島在地漢人菁英，也就是當初《可愛的仇人》這部作品鎖定的主要讀者群而言，華人情結事實上正是其集體意識中盤根錯節的一個側面；他們不可避免地精神上會對「中國」這個猶如亡靈暗影般龐然的存在，懷有各種五味雜陳的感受：既充滿隔閡卻又覺得先天上存在利害攸關的羈絆、既有被辜負的義憤卻又帶著獨善其身者會有的內疚感，而這些糾葛的感受顯然不可避免地牽制了他們這個社群在國族身分認同上的意向，使得原本應該自然發展出來的在地新國族身分瀕臨難產。秋琴與王志中後來在人事已非、滄海桑田之後，仍然無法隨著外在阻力的降低而突破自己守貞的執著去跟對方結合，表徵的是集體意識中仍深植華人情結的這一輩尚活躍於世期間那台灣在地新國族身分樹立的無望，必須著落到更下一代身上才能開花結果，就如同作品中下一代的王萍兒與莊麗茹這兩個角色的結合。

將莊建華及淑華這兩個角色解讀作是在《可愛的仇人》裡彰顯中國因素的功能性載體，從而發展出的上述這一番分析，有助於讀者從更幽微的切入點著手去掌握這部作品夾帶的國族政治意涵那錯縱複雜的層次；其所以複雜，主要的因素就在於其間那華人情結乃是糾葛蔓生於政治社群集體意識當中的，最後使這個面向爬梳起來顯得頭緒萬端，亦使得這部作品若要適切表現出這個面向便只能寄託於一套相對不尋常的操作，有賴於我們在挖掘其政治意涵之際投以入微的觀察。順著本文至此這一系列觀察所遵行的方向，我們大致能察覺到《可愛的仇人》在涉及國族政治意涵的面向那隱晦的表現手法，背後的用意應當不至於是要就中國因素本身傳達出一個簡明的態度來訴諸讀者的同感，就像針對日本因素所表達的那種簡明的激進式反殖民態度，因為當時台灣本島漢人菁英所組成的讀者群對於中國這塊故土的感受普遍混雜了愛惡交織、欲拒還迎等五味雜陳的成分，不像對日本的感受能夠化約為相對簡明的態度；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可愛的仇人》會不吝在作品中好幾處耗費不少筆墨，一再地描寫秋琴或王志中以喃喃自語的獨白或長篇累牘的對白來強調自己為亡夫或亡妻守貞的決心，或佐以實際行動來展現這種決心，例如王志中被友人拉去宿娼而坐懷不亂這種本來完全沒必要占據相當篇幅的情節。讀者如果稍加比較各處強調守貞決心的獨白或對白語氣，還能發現它們彼此間的差異不小，有些是出於堅定的口吻，有些則帶有自我懷疑乃至迷惘，還有些甚至透露出些許不甘心的意味，這就跟台灣本島漢人對中國的國族身分認同一樣，從來就不是簡單直接的忠誠而是出自無法用三言兩語理清緣由的莫名執著；像這樣一種並不純正而帶有諸般雜念的忠誠之所以能執拗地延續下去，只能歸因於根深蒂固的心理情結的作用，此即本小節探討的所謂華人情結。在台灣／台灣人被殖民時期的政治處境中，中國因素在檯面上的被迫缺席，使得華人情結相當於從表層被埋入到了台灣本島漢人的意識深處，卻也同時使得這種情結由於重重壓抑反而無法得到適當的釋放紓解，始終側身於整個社群

集體意識內影響著這個社群在國族政治面向的能動性，就如同《可愛的仇人》當中莊建華及淑華在秋琴及王志中生命裡的斷然缺席，反而使未亡人對亡者的感情糾葛無法得到適當的釋放紓解，以致於牽制了秋琴及王志中放下這段糾葛並投向下一段感情關係的能動性。

如果說《可愛的仇人》這部作品將情節往前推進的主要動力在於秋琴與王志中能否實際結合的這一懸念，而現實中台灣人集體命運的未來走向被認為相當程度同樣取決於某個懸念，即在地新國族身分的認同能否凝聚到眾志成城乃至堅不可摧，那麼，吾人當能看出這兩者之間委實不可謂沒有潛藏的對應關係存在著；至此，本文將《可愛的仇人》解讀為一則政治寓言的嘗試，或許已經堪稱獲致至少不僅止於野人獻曝或敝帚自珍的相當成果了。

四、結語

綜合以上涉及地理政治及國族政治意涵的一系列分析，本文主張，《可愛的仇人》這部作品完全有充足的條件被解讀為一則政治寓言，其中秋琴及王志中這兩個核心角色的地位及遭遇，即相當於台灣／台灣人在日本殖民時期政治處境的表徵，足以為「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來好像是關於個人和利比多趨力的文本，總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來投射一種政治：關於個人命運的故事包含著第三世界的大眾文化和社會受到衝擊的寓言」（Jameson 著、張京媛譯，1994：93）¹⁵這樣一種當代文學批評上的洞見提供又一個生動的例證；藉由作品裡若干值得細細咀嚼的操作手法，《可愛的仇人》將台灣都會漢人社群集體意識當中富有政治意涵的一個不易清晰觀照的側面，亦即有關市鎮意象與華人情結等相對偏於隱晦的內在樣貌，有效地傳達了出來。在地理政治意涵的面向，秋琴一家所居住的地點從「K 地」、「Y 地」這種具有負面含義的去脈絡化指稱方式，隨著作品中當事人生活際遇的改善轉變為明確的地理名稱「高雄」，意味著當事人走出了殖民地那欠缺歸屬感的地理空間經驗或感受、而與周遭環境建立起實在的連結，猶如重新獲致了一方新天新地；這種積極進取的政治意涵，與既有研究成果針對作品裡王志中等具有海外經驗的角色所辨識出的政治意涵遙相呼應，亦即前者屬於台灣境內因素，後者則係東亞區域架構下的跨境流動因素，兩者的揮灑或輝映可以說共譜了內外兼修的某種「台灣本位性」理想圖像。至於在國族政治意涵的面向，《可愛的仇人》除了一方面祭出近似「機械降神」的手法、另一方面著力於再現一個淡化了個別殖民者身影的激進式殖民地

¹⁵ “Third-world texts, even those which are seemingly private and invested with a properly libidinal dynamic - necessarily project a political dimension in the form of national allegory: *the story of the private individual destiny is always an allegory of the embattled situation of the public third-world culture and society.*” (Jameson, 2000: 320)

社會，而使作品中的英國因素與日本因素都各得其所之外，又安排了莊建華與淑華這兩個以「華」字為名的角色作為彰顯中國因素的載體，藉此讓兩者各自的未亡人秋琴及王志中喪偶後決心守貞的種種糾結的言行，恰恰能被視作相當於華人情結在台灣本地漢人內心錯縱複雜的那糾葛一面經過文學加工後的反映。就此觀之，《可愛的仇人》所揭示給讀者的既有實現理想的美好期許，又包羅了阻礙理想的無奈限制，其層次肌理的多面性委實不宜小覷。

對於所有在探討日本殖民時期台灣文學作品時已然習慣細細去咀嚼、品味其潛話語的深度閱讀者而言，《可愛的仇人》這一則寓言案例所凸顯出的，或許恰恰——至少在涉及國族政治的面向——是就一個文學批評饕客來說嚐起來後勁最強的一味，此即所謂缺席與在場的政治。如果說《亞細亞的孤兒》這部經典政治寓言的成功在於主角胡太明的遭遇「不斷表明作為『台灣人』身分出場的不可能性」並且「弔詭地指出了台灣特殊的存在處境，以及台灣與亞洲之間的『非關係』(non-relation)」(李育霖，2009：200、204)，那麼《可愛的仇人》這部作品之所以會讓兩個以「華」字為名的角色成為自始至終的亡靈，欲在一篇以台灣本島漢人為目標讀者的小說裡作為主人翁活生生的婚配對象來展現其音容笑貌而不可得，其實意味的就相當於日本殖民背景下中國因素在台灣這個政治社群中堂而皇之浮上檯面的「不可能性」；就因如此，台灣與中國之間，也就是秋琴與莊建華、王志中與淑華之間，所維持的關係只能夠是一種「非關係」，一種既無從往下發展又無法往後解消的特殊羈絆，彷彿流淌著缺席與在場本身那無從辨證的弔詭本色。惟有最極端的抵抗行動，才能夠對治類似這樣一種存在處境上的弔詭；根據學者李育霖的解讀，在《亞細亞的孤兒》中胡太明實際上是用他的瘋癲作出決絕的抵抗，¹⁶那麼，在《可愛的仇人》裡，我們或許可以說這種抵抗所採取的行動模式是決絕程度不下於發瘋的一種樣態，那就是死亡——莊建華與淑華早在敘事時間開始前的死亡，以及敘事中後段秋琴與王志中的相繼謝世；不論是在寓言中用來表徵「中國」或者「台灣」的人物，彷彿都在抵抗那種「非關係」對其能動性的抹煞，即便此等抵抗行動所展露的姿態本身相當於一種放棄或絕望。最終，此一弔詭的存在處境事實上仍然絕望地延續著，輾轉衍生到了當事人下一代的遭遇當中，只不過，此時似乎換作替王萍兒誕下私生嬰孩「萍太郎」的君子成為絕望的抵抗者了，緣其在小說結局處邁向難產死亡的這個安排，可謂表明了踐履「內台一如」國族政治口號的行動者在台灣這個政治社群裡出場的不可能性；當然了，在建立起充分的論述支撐之前，這或許只是一個不成熟的解讀方向，待他日如有機會當再就此另文詳探，繼續深究該等涉及缺席與在場的幽微政治意涵如何被夾帶於寓言式的文學作品中。

¹⁶ 完整的論述內容請參考李育霖〈台灣作為方法：重讀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2009)。

一如我在本文的前言當中所提及的，本文至此的這一系列分析將《可愛的仇人》作者的背景等外在脈絡上的經驗資料基本上皆予排除不論了，因此我在本文中獲致的成果相當程度上近似於深度解讀文本而來，與作者的本意不見得相符；然而這與其說是研究上的限制，或許更適合看作是爲了追求更進一步的詮釋可能性所採取的一種可欲的舉措。如果研究者過度地重視作者徐坤泉遺留下的那些不乏迎合「日華親善」一類殖民帝國國策的言論——這類的資料從既有研究成果披露的內容看來還不在少數，在此就不一一列舉了——而就此釐定了《可愛的仇人》這部作品的解讀方向，排除了那些激進的詮釋可能性，難保不會有畫地自限之虞，因爲在殖民體制的言論尺度下，激進的觀點顯然是沒有條件出現在檯面上來播送的，公開言論往往只能採用保守立場作爲包裝；爲了偵測出這些包裝底下可能的潛話語，適度地擱置公開言論的表面意涵許多時候乃成爲一種可欲的舉措，比如在解讀一份殖民時期文學作品時將作者留下的日常言談先予存而不論。當然了，退一步而言，徐坤泉本人有可能真的就是一個發自內心的保守人士，然而即使如此，研究者對其作品的激進式解讀不見得就會因而失去價值；當代的諸多文學理論早已經指出了作者的意圖爲何對於作品／文本的詮釋不具有優越地位，只不過此一環節若要討論下去難免將偏離本文的焦點，在此就不進一步展開了。

最後，我在此必須承認的是，本文對於《可愛的仇人》夾帶的相關政治意涵所作的解讀，基本上是完全以台灣本島漢人爲中心的，包含文中數度提及的「台灣人的能動性」、「台灣人的政治處境」等用語，其實都是以漢人的本位來談漢人社群的能動性或政治處境；不可諱言的，這種視角無法避免其偏狹之處，傾向於擱置台灣在漢人以外各式各樣政治社群的存在，也忽略了漢人社群內部仍有性別、地域等各種分歧，距離當代理論所追求的去中心化理想仍有一段距離。因此，我這份解讀即使真具有文中所指出的激進性，也只是相對的激進性而已；個人最終的期待其實還是在於本文能夠發揮拋磚引玉之效，希望在這次的嘗試之後能持續看到研究者從台灣本島漢人本位以外的其他視角，就《可愛的仇人》提供更多不同的解讀，挖掘出其間的諸如階級政治、世代政治或其他更讓人目不暇給的政治意涵。《可愛的仇人》這部被認爲最受歡迎的台灣戰前通俗小說問世距今恰恰八十年，然而針對這部作品更多的知性探索工程，相信才正要開始。

（責任校對：邱比特）

引用書目

- 朱惠足，2009，〈「小說化」在地的悲傷：皇民化時期台灣喪葬習俗的文學再現〉，收錄於朱惠足，《「現代」的移植與翻譯：日治時期台灣小說的後殖民思考》，台北：麥田，頁 229-271。[Chu, Huei-chu. (2009). Fictionalizing Indigenous Mourning: Taiwanese Funerals under Japanese Imperialization. In Huei-chu Chu, *The Transplant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Modern:" Postcolonial Thinking in Colonial Literature from Taiwan* (pp. 229-271). Taipei: Rye Field Publishing.]
- 李育霖，2009，〈台灣作為方法：重讀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收錄於李育霖，《翻譯闖境：主體、倫理、美學》，台北：書林，頁 165-210。[Lee, Yu-lin. (2009). Taiwan as a Method: Rereading Wu Zhuoliu's *Orphan of Asia*. In Yu-lin Lee, *Liminality of Translation: Subjectivity, Ethics, and Aesthetics* (pp. 165-210). Taipei: Bookman Bookstore.]
- 林芳玫，2009，〈台灣三〇年代大眾婚戀小說的啓蒙論述與華語敘事：以徐坤泉、吳漫沙為例〉，《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 7 期，頁 29-65。[Lin, Fang-mei. (2009). Enlightenment Discourse and Chinese Narration in the Popular Fiction of the 1930s: A Study of Xu Kun-quan and Wu Man-sha.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7, 29-65.]
- 林芳玫，2013，〈謝雪漁通俗書寫的跨文化身分編輯：探討〈日華英雄傳〉的性別與國族寓言〉，《台灣文學學報》，第 23 期，頁 29-62。[Lin, Fang-mei. (2013). The Popular Writing of Xie Xue-yu and Transcultural Identity Editing: Exploring Gender and National Allegory in "The Heroines of Japan and China." *Bulletin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23, 29-62.]
- 林佩吟，2010，〈「文明」的磋商：1930 年代臺灣長篇通俗小說——以徐坤泉、林輝焜作品為例〉，《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 8 期，頁 1-32。[Lin, Pei-yin. (2010). Negotiating "Civilization": Popular Fiction from Taiwan in the 1930s—Taking Xu Kunquan's and Lin Huikun's Works as Examples. *NTU Studies in Taiwan Literature*, 8, 1-32.]
- 阿 Q 之弟，1998，《可愛的仇人（上）、（下）》，台北：前衛。[Younger Brother of Ah Q. (1998). *Loveable Rivals*. Taipei: Vanguard Publishing.]
- 施淑，1997，〈日據時代台灣小說中頹廢意識的起源〉，收錄於施淑，《兩岸文學論集》，台北：新地文學，頁 102-120。[Shih, Shu. (1997). Origin of the Decadent Spirit in Japanese Colonial Literature from Taiwan. In Shu Shih, *Essays on Cross-Strait Literature* (pp. 102-120). Taipei: New Land Literature.]

- 柯榮三，2013，《雅俗兼行：日治時期台灣漢文通俗小說概述》，台南：台灣文學館。[Ke, Jung-san. (2013). *Combining the Elegant with the Popular: An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Popular Fictions from Taiwan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Tainan: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 柳書琴，2011，〈事變、翻譯、殖民地暢銷小說：《可愛的仇人》日譯及其東亞話語變異〉，收錄於王惠珍主編，《戰鼓聲中的歌者：龍瑛宗及其同時代東亞作家論文集》，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頁 277-321。[Liu, Shu-chin. (2011). The Incident, the Translation, and the Popular Fiction from a Japanese Colony: The Japanese Translation of *Loveable Rivals* and the Shifting about East Asia Discourse within It. In Hui-chen Wang (Ed.), *The Vocalist Whose Singing Echoes the Voice of A War Drum: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Lung Ying-tsung and Other East Asia Writers in the Same Period in History* (pp. 277-321). Hsinchu: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 高啓進，2002，〈澎湖望安小說家「阿 Q 之弟」：徐坤泉（1907-1954）〉，收錄於紀麗美主編，《澎湖研究第一屆學術研討會論文輯》，澎湖縣：澎湖縣文化局，頁 186-207。[Kao, Chi-chin. (2002). Younger Brother of Ah Q, The Novelist from Wangan, Penghu: Xu Kun-quan (1907-1954). In Li-mei Chi (Ed.),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Conference on Penghu Research* (pp. 186-207). Penghu: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Penghu County.]
- Jameson, Fredric 著、張京媛譯，1994，〈處於跨國資本主義時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學〉，收錄於 Fredric Jameson 著、張京媛譯，《馬克思主義：後冷戰時代的思索》，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頁 87-112。[Jameson, Fredric. (1994). 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In Fredric Jameson, *Marxism: Thoughts on the Post-Cold War Era* (Jing-yuan Zhang, Trans.) (pp. 87-112).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ublishing.]
- Jameson, Fredric. (2000). 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In M. Hardt & K. Weeks (Eds.), *The Jameson Reader* (pp. 315-339).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The Present Absences: Reading the Novel *Loveable Rivals* as a Political Allegory

Weng, Hsiao-ming
Ph. D. Student,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Being acknowledged as the most iconic popular fiction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Loveable Rivals* is obviously a valuable text to academic research;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large amount of political significance within *Loveable Rivals* waiting for further analysis after many researchers have done their work. By observing both the geopolitical and nationalist political aspects of this novel, this paper seeks to read *Loveable Rivals* as a political allegory, in which the male and female protagonists' personal situation could be seen as the metaphor of Taiwan/Taiwanese's political situation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In the aspect of geopolitic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question of why several letters of English alphabet serve as the substitute for the distinct geographical name "Kaohsiung" in the first part of *Loveable Rivals* and why such substitute is abandoned in the second half. It then reads such performing strategy as a represent of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the sense of spatial or geographical belongingness, which is always conceived as the very lack of many individual mind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colonial rule. In the aspect of nationalist politic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question of why two of the absent characters with the word "hwa"(華) in their names are capable of influencing vitally the male and female protagonists respectively across the board, and reads these two absent characters as the political Chinese factor which has been forced to keep absent from Taiwan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Based on the above evidenc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Loveable Rivals*, through its literary devices, effectively speaks for a dimension of Taiwanese elite islanders'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which is rich in politic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Loveable Rivals*, allegory, Taiwan, geopolitics, nationalist politics

